

论容闳的爱国道路

刘新建

鸦片战争的炮声终于使某些中国人从沉睡中惊醒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被“红毛小鬼”打败，素称礼义文明之邦的“大清”疆土遭到蹂躏，黄帝的子孙惨遭屠杀。痛苦的现实逼迫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寻找救国的道路。先进的人们终于发现，要救国，“只有学外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65页）容闳就是最早向西方学习，并毕生为祖国命运奋斗的先进人物之一。

容闳字纯甫（1828—1912）；出身于广东省澳门西南方彼多罗岛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47年随传教士去美国学习，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次年回到祖国。他怀着满腔爱国赤诚，为探求救国之路奋斗了一生。

容闳的毕生的奋斗虽然总是同失败联系在一起，但他却并不因一再失败而丧志；他为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而上下求索，也不因种种挫折而中止。他始终不渝地为救国而呼喊，为中国的进步发展而奔走。他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存在着探索过程中的曲折，但依然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条顺应时代步伐的爱国之路。

（一）

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一。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08页）鸦片战争后，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不断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丧权辱国的现实揭示了落后挨打的必然结局，也客观地规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那就是说：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以有效地抵御列强的侵略。围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容闳同抱残守缺的封建顽固派的所谓“爱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并没有使封建顽固派得到应有的教训。在几十年中，他们始终遵奉着老祖宗“贱商卑夷”的老传统，认为向“夷人”学习有失华夏大国的体统，他们咒骂向西方学习的人：“师事洋人，可耻孰甚”，甚至是“廉耻丧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一册121页)“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47页)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攻击提倡西学是“习为技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洋务运动》第六册228页)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打了个比方,把当时之形势比作“君父之有危疾”,守旧派既然自命为“忠臣孝子”,但他们既不求医,又不学医,相反却“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戊戌变法》第一册47页)这就是封建顽固派的“爱国”观。

在这面“爱国”大旗之下,他们竭力反对和扼杀一切向西方学习的救国措施。同治五年(1866年),有人建议清政府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班,著名理学家大学士倭仁首先大肆攻击,说这是“求一技之末,而又奉洋人为师”,违反了“立国之道”。(转引自肖一山《清代史》220页)在他的煽动下,封建士大夫们无人肯去天文算学班学习。1872年,在洋务派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容闳等人带领120名留学生赴美,计划学习十五年,遭到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他们认为,让学生“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似乎向西方学习同爱国心水火不容。在这些人看来,“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必须“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西学东渐记》第103页—104页,以下简称《西学》)由于他们的“爱国主义”谬论,清政府竟然撤回了全部留学生,解散了留学生事务所。

面对着列强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顽固派也谈“救国”,但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他们依然求助于老祖宗,空谈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转引自肖一山《清代史》220页)只要讲“礼义”,收拾“人心”就行了。还有人说,中国要自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其余都是歪门邪道。(《洋务运动》第二册29页)要抵御外来侵略固然离不开“练兵”,但如有人主张以西法练兵,又难免有离经叛道之嫌。在他们看来,只要按照老祖宗的办,便无往而不胜:祖宗是以旗人兵力得天下的,他们还主张练“旗兵”;甚至古代的什么“一字长蛇阵”之类。甚至还有人提议,用中国古代的火箭专打敌舰的烟囱,便可“制敌死命”。

很显然,落后的思想武器和物质武器抵挡不住先进的资本主义强盗。这些老古董一遇到洋鬼子不是溃逃便是屈膝。正如梁启超所说:“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资料》下册924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那个自命高贵,不屑与“夷人”打交道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当英国人攻进广州后,他竟当了俘虏,替侵略者赋诗作画去了;义和团运动中,对洋鬼子“恨之入骨”、表示要与他们“一决雌雄”的那拉氏,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便仓惶逃跑,并无耻地向帝国主义献媚,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为他们的“爱国”作了绝好的注脚。所谓“爱国”,其实是误国、卖国。

容闳的爱国观与封建顽固派是尖锐对立的。他顺应了激荡的历史潮流,力主向西方学习。

容闳主张向西方学习，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现状。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就时时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情形”，随着知识的增长，他愈有深切的感受。对于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常常“怏怏不乐”。（《西学》22页—23页）回国后，他耳闻目睹的事实进一步使他感到改变落后现状的必要。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不断侵入，“侵夺我治外法权”，任意侮辱我同胞，破坏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妥协退让，同时却认为“天朝上国”的一切尽善尽美，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容闳对此痛恨不已。他认为，正是守旧的封建君臣们“夜郎自大，顽固成习，致有受人侮辱之结果”。（《西学》39页）他一反顽固派“振纲纪”、“用人心”的陈词滥调，主张“借西方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只有这样，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才有可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西学》88页）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也曾揭露顽固派“泥古不化”，把西学“诋为异学，甘受固陋，以受制于人”的愚蠢行为。（《戊戌变法》第一册46页）相比之下，容闳首先指出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的恶习，揭示了守旧误国的要害，力主以西学“改良”中国旧文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他应是觉醒更早，头脑更清醒的一个人。

容闳一生为传播西学奔走呼喊，正反映了他同顽固派截然不同的爱国观。他给太平天国的七点建议，其中就有四条讲到教育问题。其后，他给曾国藩建议，力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他对西方学教育寄予莫大的希望，其出发点就在于反抗外来侵略。他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它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岗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份都大权旁落”。这就是他普及西学教育、派遣留学生的“主要论据”。（《西学·代跋》11页）同时，他从切身体会中，感到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因此，他幻想通过推广西学，使中国“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这样，就个人而言，无论何人，“有敢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大而言之，“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西学》49页）容闳的“教育计划”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守旧派当政的时代，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是势所必然的。但从当时中国的需要来看，他的主张并不因不能实施而稍损其爱国意义和时代意义。

容闳反对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的狭隘“爱国”观，力倡西学，但他并不像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政治家，仅仅着眼于船炮技术和先进武器，而是注目于西方的“学术思想”，企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西学》23页）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并试图以这种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改造中国，这就使容闳的爱国主义思想充溢着时代的气息。

(二)

1855年，容闳从美国归来。在由此开始的探求救国之路的实践中，他首先遇到了太平天国革命。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反映了他的进步历史观。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志士，试图用火与剑来改造中国，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为祖国的新生而探索的容闳，对此不能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容闳通过深入观察和实地调查，对太平天国革命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首先肯定了这次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遂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的贪污机关矣”。（《西学》61页）推翻这样的政府是理所当然的。容闳“深感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并且“几欲起而为之响应”。（《西学》31页）基于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他和太平天国志士的立场、感情趋于一致。

在调查过程中，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亲眼看到太平军竭力保护人民，“商不辍业，农不辍耕”的景象。对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个人品质以及军队纪律十分推宗，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这种态度同竭力维护旧制度的封建君臣，包括某些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的封建官僚是根本不同的。

推翻旧王朝固然是必要的，但容闳更关心的是建设怎样的新政权。正就在这个问题上，他同太平天国分道扬镳了。

太平天国革命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样，虽然“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都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的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列宁选集》第四卷496页）这正是没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的必然结果。容闳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从目睹的事实中已经见到了太平天国的悲剧结局。

过去，有人认为容闳在1860年底离开南京，是因为看到太平天国快要失败。这种说法实际是附会。他在南京考察期间，曾想尽力对太平天国进行帮助。他给洪仁玕提出了七点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就当时来看，这些措施应当是移植西方文明，发展民族资本，巩固太平天国政权的进步计划。容闳还表示：“倘不以迁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西学》57页）然而，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起义，它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立场，容闳关于发展民族资本的建议，也不可能为他们所采纳。几天之后，洪仁玕送给他一颗官印，封他为四等爵，这使容闳非常失望，他拒

绝了爵位，并进一步表示：“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如愿实行这七条建议，“则予必效奔走；无功之赏，必不敢受。”（《西学》58页）他怅然离开南京，感慨地说他过去“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持。予以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西学》63页）可见，容闳与太平军分手，主要是因为能否“造就新中国”，这个根本问题上有分歧。

容闳离开了太平天国革命，是非得失，只能用时代的尺子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只能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唯一的准绳。近代中国，用资本主义代替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历史的要求，顺应这股潮流，则是进步的。对于容闳与太平天国领袖之间的分歧，也应当这样看待。

容闳用新的历史观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分析，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致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则常常相因，乏新颖趣味”。（《西学》58页）当然，历代农民起义对推动社会进步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容闳的上述说法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他认为历史上的“革故鼎新”只是一个封建王朝代替另一个封建王朝，并不能改变“国体”和政治制度，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追求的“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国体”和政治的“改革”。应当说，他比太平天国的志士们理想更高，追求的目标更加清晰，其进步性也是明显的。

基于这种历史观，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如同埃及金字塔下的狮身人面像，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要“除旧布新”，幻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它比较历代的“鼎革”，还有其“特异之点”，即“含有宗教性质”——遵奉着西方传来的“上帝”。然而，他们向西方所学习的似乎仅此而已，其余几乎一仍旧观，这就反映出它的另一个侧面，它仍在走着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军队成份越来越复杂，“迨占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62页）这些看法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实际。据当时的反动文人记载：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声色货利。”（张德坚《贼情汇纂》）这正是旧代农民革命的可悲结局。不过，容闳与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是：他是惋惜太平天国走回了老路，不能实现建立“少年新中国”的目标。其后，孙中山先生也说过：太平天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他们都是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的。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旧式的农民革命已担当不起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容闳对太平天国的看法，真可谓慧眼独具。他的可贵就在于，对这种农民革命并不是以贵族老爷的态度，一概斥之为“匪”；也不肯退到旧式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去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容闳持这种历史观始终如一。义和团运动后，他曾对友人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对义和团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承认其落后，主张“纳民气于正轨”。（刘禹生《世载堂杂忆》114页）这都是有识之见。具体到太平天国运动，容闳与洪秀全都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但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追求的目标很不一致。如果说，洪秀全等人不自觉地陷进了历史的漩涡，而容闳则是清

醒地冲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这些，他离开太平军就不足为怪了。

(三)

容闳离开了农民起义，投身于洋务运动，但是，他和洋务派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何处去寻找改革社会的力量？容闳感到茫然。“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西学》63页）正在这时，曾国藩以书相邀，他便转而寄希望于某些通达时务的“政界中重要人物”，幻想通过他们的倡导，以兴办实业来“谋社会之进化。”近代中国，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无疑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兴办实业，发展近代工业应当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当时容闳虽然不会明确地认识这个道理，但他把兴办实业同“社会之进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比洋务派的高明之处。表现在办实业的目的、方向等方面，他同洋务派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

首先从办实业的目的看，容闳与洋务派截然不同。

洋务派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提倡“自强”也好，标榜“求富”也好；他们搬来西方的军事技术，无论是由于镇压农民起义还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都是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是由其封建官僚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容闳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是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谋求民族的进步出发的。早在参与洋务活动之前，容闳在利用经商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就目睹外国资本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中国工商业者“生计事业已十夺其九”，殖民者输入机器，强迫中国订立商约，“中国劳动界之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中国将来之经济、实业、政治上皆有重大影响也。”（《西学》46页）在滔滔扬子江上，他看到外国船只横行，便慨然叹息说：“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获此幸福也”。（《西学》45页）他并不反对通商，也不反对引进外国机械设备，而主张这些措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推行。这正是他从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投身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与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派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容闳与洋务派追求的目标既不同，在具体的洋务活动中，二者的主张和行动也不免南辕北辙。

洋务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对内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同时，对待外国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不能抵制，往往以“中外合资”等形式，使外国侵略势力因利乘便，得以控制某些工矿企业；他们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使一些企业受其操纵；由于其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迫切需要，洋务派首先着眼于军事技术，一切依赖于洋人，常常连钢材、木材、水泥、煤炭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致受到外资的严重剥削。这样举办近代工业，无法收到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的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就是证明。容闳则相反，他始终把发展民族资本作为他所追求的建设“文明富强”新中国的主要内容。

在曾国藩延请他筹办江南制造局时，他首先谋求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主张先建立机器母厂，然后建立各种子厂；不仅要制造枪炮，还重制作“农具、钟表以及其它种种有机之物”，这样，“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廉价多矣”。（《西学》75页）他还提议在江南制造局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西学》85页）其后，他鉴于“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越俎代庖之象”，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四条发展民族资本的计划：

- 其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
- 其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 其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 其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之侵入”。（《西学》86页—87页）

当时的中国，从社会的进步看，急需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从反侵略的立场看，需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权利，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材，容闳的四项建议正反映了这种需要。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包括身居要职的洋务派官僚，由于其阶级的短视，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他们沉醉在“同治中兴”的美梦中，容闳的建议如石沉大海，他在封建主义的堡垒面前又一次碰了壁，感慨万分地说：“予之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 试……亦安能无快快哉！”他甚至觉得“心意都灰”，（《西学》88页）这是对洋务派的更大失望。他报国无路，又值妻子新丧，便去美国凄然闲住了十余年。

容闳对洋务派的失望，本身也恰恰反映了他与洋务派之间的界限，这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谋求社会进步与维护封建统治的界限；是近代中国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界限。

过去，人们在评述容闳时，往往认为他从赞颂太平天国革命到参与洋务运动、置身曾国藩幕府是一种倒退，这其实是以农民革命作为权衡历史人物的标尺。我认为，容闳不管是支持太平天国还是寄希望于洋务运动，他一直是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上的，他寻找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他力图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心是前后一致的。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时代，他壮志难酬，这是历史的不幸。容闳作为勇往直前，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他并无所谓倒退。

（四）

寓居海外的容闳，其爱国心并未停止搏动。晚年，他作为眷怀祖国的海外赤子，时时在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祖国在召唤他，“爱国之心油然而生”，连发两封信给国内的朋友，“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争”。（《西学》114页）但是，腐朽的清王朝如大厦将倾，注定了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他因为“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认为，要挽救国运，必须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以前，他一直幻想着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

但却企图通过办教育、办实业等途径来实现其理想，结果一事无成。以往失败的教训，终于使他认识到要从改变旧制度着手，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转变，也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怀抱着这个宏愿，1859年他回到祖国的怀抱，又一次投身于救国的实践。

进步的要求，错误的方式，使容闳回国后第一步就碰了壁。他先后给两湖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中国要富强，“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原有之声誉”。“中国各行政机关”，必须“按欧西之成规，重新组织”，“舍此计划，实无救亡良策。”（《西学》116—117页）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正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国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在积极宣传改革，主张学习日本和俄国，改良政治，“制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以“公车上书”为标志，形成了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运动，这无疑是一次进步的爱国运动。容闳“重新组织”政府的主张顺应了这股潮流。但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他幻想依靠张之洞等封建官僚来推行这种“新政策”，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他毅然辞去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赐给他的冷板凳，转向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容闳的思想与维新派不谋而合，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康有为、梁启超。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西学》112页）对于主持变法的光绪帝，他寄予了无限希望，认为他是“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中国革新之先导”，于是，便通过帝党官僚张荫桓、翁同龢和给光绪帝上条陈，建议开铁路、办银行。但因顽固派破坏，无一实行。不久，那拉氏发动政变，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容闳遂去上海，托迹租界。在租界中，他依然在继续维新事业，“组织一会，名为中国强学会，以讨论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他被推为第一任会长（《西学》123页）（按：据汤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所载：1900年，容闳等以“保种救国”为辞，参加上海张园国会，容为第一任会长）后因清政府指名通缉，他不得不逃往香港，后去美国。他企图通过改良政治来改变中国封建制度的主张又一次遭到失败。历史证明，戊戌维新运动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容闳作为维新党人，不失为一个寻求真理的爱国志士。

远避异国，容闳依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1903年，梁启超亡命美国，会见了容闳。容时国家年七十六岁。在梁启超眼里，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他同梁启超促膝谈心，“策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梁启超《新大陆游记》54页）但此时，他虽然爱国之心如昔，但因脱离了实践，特别是国内革命形势已发生了急剧转变，坚持改良道路的梁启超已不是戊戌时期的梁任公了。容闳与他“示党论之方针”等清谈，不能不象他的年龄一样显得苍老。

然而，容闳与梁启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继续沿着改良的旧路走下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对“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地注视”，对革命党人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壮举表示赞许和欣慰。次年，他的大儿子回到他理想中的“新中国”，被孙中山先生等任命为广东制造局总工程师兼总理，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先生还不远万里，送给容闳一张照片，表示对这位海外赤子的关怀。可以认为，容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

（下转第100页）

位和它的历史命运两个方面，即：一，就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与资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较而言，无产阶级是贫困的。二，就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积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鸿沟愈来愈深。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的经常存在和增加；在国民收入中工人所得到的份额愈来愈小或在业工人相对工资的下降；税收加重，物价上涨，实际工资有时下降；一部分赤贫者生活状况恶化和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有时恶化等。弄清楚这些理论问题，对正确认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②、浩风：《谈谈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争论的关键》，《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③：林白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及其《早期著作到〈资本论〉的发展》，《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④段德元：《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区分是一种曲解》，《兰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7—368页。

⑥同上，第367页。

⑦同上，第372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08页。

⑨《列宁选集》第二卷712页。

⑩于光远、苏星：《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册91页。

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⑫于光远、苏星：《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上册第94页。

⑬同上，第91—92页。

（上接第96页）

段，已离开了改良道路，支持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

容闳的一生，虽然经过很多曲折，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曾有过某些错误。但是，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的真理，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的一生是爱国主义的一生。以往，有人把他贬斥为“买办”之类，似乎很不公道。